

香港的日本研究： 回顧與前瞻（1942-2021）

吳 偉 明

一、前言

日本研究是一門以日本歷史、語言、社會、文化為研究及學習對象的學科。它在香港已有約八十年（1942-2021）的歷史，以戰後的日語教育作起步，至二十世紀八、九年代發展成全方位的日本研究，至今已成為亞太地區日本研究的樞紐之一，在研究及教學均有卓越表現。香港的日本研究由戰後至今一直持續成長，已發展成全球日本研究中相對成熟的地方，在多方面均具備自己的特色及優勢。不過在其成功的背後亦隱藏不少問題，這些問題若無法妥善解決，日本研究的發展將難以持續，甚至可能會日漸衰退。本文介紹日本研究在香港的歷史及現狀，並剖析其特色及面對的挑戰。

二、歷史與現狀

日本研究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至日治時期（1942-1945），當時的教育及傳媒均致力推廣日語及日本文化，以配合當時的統治需要¹⁾。戰後日本研究的發展隨港日關係的深化及日本軟硬實力的提升而不斷成長。它可劃分為三大時期：草創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成長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及成熟期（2000年代至今）。

草創期的特徵是出現小規模的日語教育及留日活動。戰後初年香港的反日情緒高漲，加上日本百廢待興，所以港人普遍對學習日語、留學日本及認識日本文化的興趣不大。隨着日本經濟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起飛、港

日在經貿關係的改善及日本電影與電視劇的流行，港人對日本的印象大為改觀，對日語、日本文化及旅遊日本產生興趣。1962年香港日本文化協會成立，成為推廣日本文化最重要的機構。

在日語教育方面，1959年香港首間民間經營的日語學校導正日本語學校成立，由沒有受過日語教育訓練的年青日人充當教師，供成人晚上學習日語。自此日語學校及課程不斷增加。1962年香港第一日文專科學校開校，由曾留日湖南人唐新樹及新亞書院日語講師柳內滋及伊達政之創立。柳內滋精通中日語文，親自編寫日語教材。1968年香港日本總領事館設立日本語講座，為香港市民提供學習日語的機會。大專界的日語教育以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成立的日文組（1972年起設副修課程）為起點，日本政府派遣一位客座教授及兩位客座日語講師赴崇基學院教授日本文化及日語。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及香港大學亦分別於1977年及1979年開設日語科目。這個時期香港基本上只有日語教員，缺少以研究日本為專業的學者。

至於留學日本，以1953年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提供獎學金給五名港人留日揭開序幕。日本政府自1964年起每年提供文部省獎學金（現改為文部科學省獎學金）予數名港人，供他們赴日在國立大學留學一年或攻讀研究院的碩士或博士課程。這時期亦有港人自費留日，不過人數不多。他們以學習科技及工程等實用課程為主。

成長期的特徵是日本研究學系的成立及日本研究專家的出現。1980年代日本成為傲視全球的經濟大國，亞洲各地紛紛向日本取經，香港亦不例外²⁾。港日經貿關係日益密切，日本在港的投資及日本旅客對香港都十分重要。日本亦同時成為文化大國，其流行文化及消費商品在香港大行其道，在1980年代上半及1990年代後半先後出現兩次日本熱³⁾。港人對日本語及文化的興趣大增。大專界日語課程供不應求；以1981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日文組為例，每年只能收三百名學生，候補者竟多達五百人以上⁴⁾。為了爭取學習日語的機會，學生們不惜通宵排隊簽科註冊。民間方面學習日語成風。坊間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從1980年代的五十多間，躍升至1990年代的近百；其代表之

一的日經日本語學校便是於 1986 年創校。每年除有國費生及交換生留日外，私費生留日亦相當普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年都有數百港人私費留學，他們多在日語學校或專門學校攻讀。

在上述的環境下，成立日本研究學系的條件已經成熟。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於 1985 年及 1991 年成立日本研究學系，提供主修及副修課程。日本研究學系的成立是日本研究在香港的里程碑，在教學及研究上都邁進另一個階段。兩大的日本研究學系在成立初期，獲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在日語教員、器材、書籍及學術會議上的資助。它們最初仍是以日語教學為中心，再輔以日本社會、文化、文學、經濟等科目。學生的興趣以商業日語、日本企業文化等實用科目為主。這個時期香港學者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日語發音方面有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日文化交流史專家譚汝謙為代表。他不但研究卓越，而且熱心培育下一代日本研究學者。日語發音的學者有港大日本研究學系賴玉華及中大日本研究學系李活雄。在日本語熱潮下，香港其它大專院校亦相繼在這個時期增設日語課程。此外，以中大及港大為首，香港各大專均與日本的大學建立留學交換計劃，每年有數十名香港大學生赴日留學，為香港培育不少日本研究的新力軍⁵⁾。現今香港大專界從事日本研究的香港專家（如李活雄、王向華、何志明、王小林、李培德、吳偉明等）均是在這個時期留日攻讀研究院課程。

成熟期的特徵是日本語熱潮、日本研究全面發展及流行文化的冒起。雖然日本的經濟力量自九十年代初泡沫經濟爆破後已大不如前，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對香港日本研究的資助亦有所減少，但是港人對日本的興趣不減反升。現在每年香港學習日語的人數升至約三萬五千人，日語成為繼普通話及英語外最受歡迎的非母語。每年報考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的港人逾萬。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每年選修日語的同學逾兩千，成為最多學生選修的外語。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所有八間公立大學均有日語作選修或副修⁶⁾。除大專外，2002 年香港出現首間開設日語科目的中學，2012 年日語被納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課程之內。在 DSE 六種外語科目中（日語、法語、德語、

印地語、西班牙語、烏爾都語)，以日語最受歡迎、最多學生報考。以 2018 年為例，DSE 日語共有 305 人應考，近六成考獲 A 級⁷⁾。現在全港開設日語科目的中學共 19 間，小學六間。民間日語學校及日語課程更是多不勝數，從初階入門至高階課程全備，甚至一些日語學校及社區組織增設兒童日文班及長者日文班。因日本流行文化大行其道，很多年青人喜歡自學日語，市面及網上出現不少自學日語的教材。

香港的日本研究發展日趨全面及多元，港大及中大的日本研究學系已脫離早期偏重日語教育的格局，成為全方位的日本研究教學及研究單位。非語言（如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性別研究及流行文化研究等）科目更成為研究及出版的重點⁸⁾。因語言及待遇的優勢，港大及中大的日本研究學系可吸納全球優秀人材，在研究上具國際影響力。這方面最近出版的重要學術專書有：Janet Borland, *Earthquake Children: Building Resilience from the Ruins of Tokyo*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0), Nana Gagne, *Reworking Japan: Changing Men at Work and Play under Neolibe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Daniel Poch, *Licentious Fictions: Ninjō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Japanese Nove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Jeremy Yelle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en Total Empire Met Total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d Wai-ming Ng, *Imagining China in Tokugawa Jap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9)。香港中文大學在 2014 年成立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是香港首個日本研究的研究組織。它舉辦週年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日本研究博士生論壇、學術講座系列、接待海外訪問學者、與亞洲的主要日本研究組織建立戰略合作計劃及出版專題論文集。

日本研究中以流行文化的冒起最值得注意，相關的研究計劃、出版、科目、公開講座及博士、碩士研究生都不斷增加。例如中大日本研究學系開設的「日本流行文化與文化全球化」單元課程，自 2002 年開設以來，每年吸引約六百名學生修讀，成該大學最受歡迎的選修科目之一。日本動漫及電影相

關科目亦甚受歡迎。香港大學生修讀日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從昔日的實用性（如商業日語、日本經濟及日式企業管理等科目）變成今日的趣味性導向（如日本動漫、電影及消費文化等科目）。中大日本研究學系亦以「港日流行文化的互動」作為代表2014-2020社會影響力的Impact case study（影響案例研究）。

三、特色與優勢

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發展，香港的日本研究已建立自己的特色及優勢，與中國、台灣、新加坡、菲律賓、澳洲等亞洲地區的日本研究均有所不同。其主要特色如下：

第一，課程全面。中國及台灣的日本研究在課程設計上偏重日語，大學開設多是日文系而非日本研究系。香港港大及中大的日本研究學系兼顧日語及非日語課程，比重相若，不論科目數量及修讀學生人數均平分秋色。日語多由全職或兼職導師執教，非日語科目主要由全職教授負責。在研究上以日本歷史、社會、文化為中心，日本語的研究相對較少。

第二，發展迅速。日本研究以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日文組的成立正式起步，至今經過四十多年，香港八所大學均已開辦日語課程，而且選修人數不斷增加。這跟近年歐美日本研究的衰退呈強烈對比。正因為選修日語及日本流行文化的人數不斷增加，令日本研究課程有穩健的財政作進一步發展。現今提供相關學位及資格的有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後）、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學士）、香港公開大學日本研究（高級文憑）、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應用日語（高級文憑）、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關係學系（日本研究）副修課程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日語及傳意（高級文憑）。香港伍倫貢學院在2019年起開辦日本研究文學士自資課程，成為中大、港大之外，香港第三個提供日本研究學士學位課程的大專院校。

第三，規模較大。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已有兩個日本研究學系及三個日本研究文學士課程。單是全職教師，港大日本研究學系現有四位教授及八

位講師；中大日本研究學系現有六位教授及六位講師。比起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澳洲等提供類似日本研究課程的大學，港大及中大的規模相對較大。兩大的日本專家其實不局限日本研究系的教員。以中大為例，它現有日本專家十多名，分別來自日本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工商管理及建築等不同學系。

第四，研究具優勢。香港的日本研究學者全在歐美及日本名校取得博士學位，大多精通英日中三語及熟悉三地學問，而且享有高度學術自由及跨國研究網絡，所以較能擁有全球視野及較少受政治意識形態左右。他們在日本人類學、日本歷史、日港比較研究、中日關係史、日本流行文化及華人的日語習得等領域有研究優勢，在全球著名大學出版社及學術期刊出版研究成果⁹⁾。

四、問題與挑戰

當今香港的日本研究可謂人材濟濟、人氣上升、口碑尚佳及財政穩健，但是並非沒有盲點及缺點，在表面風光的背後其實隱藏不少問題，前途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

第一，學生興趣偏向流行文化及日語，對歷史、文學、宗教、藝術、哲學、政治、經濟及外交關係等不太關心。現在港大及中大的日本研究均出現類似「80/20 法則」的情況，即八成的收入來自兩成的科目（流行文化及日語）。其餘八成的科目是在沒有營利，甚至賠本下運作。當今香港各大學鼓勵系際競爭，金錢跟學生走，造成流行文化及日語的科目愈開愈多，歷史、文學、政治、哲學等重要但不太受學生歡迎科目反成非常設科目。如何令學生以流行文化及日語為跳板，將興趣擴至其它領域，全面認識日本至為重要。

第二，培訓研究人才不足。香港的日本研究集中大學本科課程，研究院卻相對薄弱。現在港大及中大日本研究學系雖有開設博士課程，不過每年只收生數名。近年港人甚少赴海外唸日本研究相關的博士課程，本地出身的日本專家已經出現斷層。現今逾半教員來自美國、澳洲、日本、中國等地。港

大日研系的四位教授均來自海外，中大日研系的六位教授中有一半來自海外。今後發展將更依賴外國及中國出身的教授，這雖有助國際化，但本地學者的進一步減少對日本研究在香港的未來發展是一大隱憂，例如會影響港日關係及比較研究、與中國學界的交流與合作、及使用中文作教學、出版及傳媒訪問。

第三，缺乏共同合作。香港的日本研究學者多各自修行，缺乏共同合作。香港政府教資局的資助模式鼓勵各大學競爭而非合作。港大及中大日本研究學系一直存在競爭意識，彼此甚少交往，其中以非日語的日本研究學者缺乏交流及合作的情況較為嚴重。香港的日本研究只有個人，缺乏團隊，所以建立的聲譽及業績會隨人事變動而出現突變。相對而言，各大專的日語教員互動較多，他們組成香港日語教育研究會（1978年創立），出版《日本學刊》及主辦以日語教育為主的研討會。此外，以日語教員為主幹成立的港澳粵日本研究大學聯合會（2009年創立）為大灣區日語教員提供交流平臺，但是不太活躍。

第四，大學改革帶來衝擊。香港八所大學的經費均來自政府，在政府的壓力下，香港大專界近年掀起一波復一波的改革，學系改組不斷。像日本研究這類在大學體制下相對規模較小，歷史較淺及學科性質較非正統的學系頓成高危一族，隨時成為殺系及重組的對象。2004年中大日本研究學系曾一度經歷上述危機，至今仍在此陰影之下。2006年港大日本研究學系經過校方重組，成為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一員，獨立性被削減。理大專業日語文學碩士課程、城大專上學院日本研究副學士、城大國際商業（日本）課程亦在大學課程改革中停辦。

第五，新型肺炎及國安法帶來的新挑戰。2020年起新型肺炎全球大流行，對日本研究的教研造成很大的滋擾。大學的日語課改在網上用 zoom 視像進行，非常影響學習效果。2020年以來完全無法派主修生去日本留學及研究生去日本做調查。實地調查、研討會、講座、短期訪問等與日本研究相關的學術活動陷於完全停頓。此外，香港在2020年七月實行港區國安法後，在香港

大專界引起頗大震盪。日本研究如何保留人才及招募人才、如何繼續與日美英等地交流合作及如何維持教研的自由度成為新的挑戰。

五、結語

戰後至今，香港的日本研究已發展成亞太區一個主要教研樞紐。不過在經歷持續成長之後，它正處於十字路口。香港的日本研究早已進入成熟階段，其進一步的發展不能再依靠日本政府及財團，而是取決於香港政府及校方的態度。日本研究學系吸引學生的能力從來不成問題，如何令香港政府、校方及社會大眾明白日本研究的重要性才是重點所在。現在很多人仍誤解日本研究學系是學習日語、甚至是親日的地方，無法對它給予公允評價及支持。香港的日本研究必須重新為自己定位，例如強調跨學科、泛文化及比較研究的價值及讓人認識日本對香港及中國的重要性，不然難免被邊緣化，成為受學生歡迎，但不受政府及校方重視的「次等」學系。

香港的日本研究必須保持現有的優點及特色，認真面對目前的挑戰及改善不足，才有明天。不然很可能在大學改革風波中被淘汰，失去學科的獨立地位，最壞的情況是被拆骨重組。日語教學撥歸語言教育中心、語言學或外語部門，日本歷史、社會、文化則成為東亞研究或亞洲研究部門一部分，這是我們不願看見的。

註釋

- 1) Benjamin Wai-ming 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al Policie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1942-1945," in See-heng Teow, et. al. eds.,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Times*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9-92.
- 2) Wilson Wai-Shing Lee, *Learning from the Rising Sun: The Japanese Presenc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Ph.D. dissertation, 2017), Japanese Studies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3) 參吳偉明：《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與互動》（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 4) 本刊記者：〈譚汝謙博士與日本研究〉，《廣角鏡》第 111 期（1981 年），頁 48。
- 5) 參陳荊和：〈香港の日本語教育とその周邊〉，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1988 年），頁 459-467。
- 6) 有關 2000 年代香港各大專的日語及日本研究課程，參梁安玉：〈香港日語及日本研究課程的現狀與展望〉，李培德編：《日本文化在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19-234。
- 7) 陳嘉穎：〈課程淺奪 A 易 DSE 日語成升學救星〉，《大學線》第 138 期（2018 年），http://ubest.com.cuhk.edu.hk/138_dsejapanese。
- 8) 有關香港大專界的日本研究專家介紹，參 Takamichi Mito, “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in P.A. George, ed., *Japanese Studies: Changing Global Profile* (New Delhi: Northern Book Center, 2010), pp. 248-256. 最近的情況，參中大及港大日本研究學系的網頁。此外，八大的人類學、歷史、中文、工商管理、現代語言與文化、傳媒、建築等課程均有研究日本的專家。
- 9) 有關香港的中日關係及港日關係研究的成果，參 Wai-ming Ng, “Sino-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17 (2010), pp. 20-28.

